

袖珍典藏本

# 老舍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洁非散文/李洁非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509-6

I. 李…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5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5.875 印张 80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     |        |
|-----|--------|
| 一   | 鲁迅和笔仗  |
| 八   | 自 疑    |
| 十三  | 宗教之果   |
| 二十二 | 吾身吾生   |
| 三十一 | 三国别解   |
| 三十七 | 文人一种   |
| 四十四 | 自杀和被杀  |
| 五十一 | “傻”是境界 |
| 五十九 | 自古相轻   |
| 六十六 | 文人之德   |
| 七十四 | 计东尺牍读感 |
| 八〇  | 异 端    |
| 八十六 | 神往渊明   |

|     |          |
|-----|----------|
| 九十四 | 欧画玩赏四十六记 |
| 一五八 | 杂思撮钞     |
| 一八一 | 后 记      |

## 鲁迅和笔仗

七月，往山东一行，在济宁的书店购得《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读了有些感触要写在这里。附带说一句，此书内容甚佳，校对却粗率之至，真替编者、出版者惋惜。

鲁迅打了一生笔仗，这大抵谁都知道。但以往能见到的，差不多全是一面之辞。以我念书时的中学课本以至大学课本论，上面所载，如非鲁迅如何“痛打落水狗”，便是他怎样戳穿某些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至于被痛打者被戳穿者们原说了哪些话，却一律不载的，即使偶有透露，也是摘摘拣拣，掐头去尾。所以，关于这段史

事，我们实际上一直不得其详，更不得其实。之所以要这样做，倒真是令人费解，非但是没有一点好处，简直可以说反而给大家平添了好些疑云，以为里面藏着什么不便公开的内幕。其实根本一点必要也没有，当年鲁迅在世时既然并没有被骂倒，想必在他去了之后，让大家原原本本地看他与其论敌之间的种种口角，也不至于降低或夺走他的魅力与价值。

古来文人都难免闹些笔墨官司，除非他是毫无个人见地的糊涂虫。像鲁迅这样无论个性或思想都岐嶷不凡的人，自然更易于招惹“是非”，尽管如此，读罢此书我仍禁不住大为吃惊：鲁迅的论敌竟如此之多！林纾、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语堂、高长虹、郑振铎、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阿英、潘汉年、蒋光慈、梁实秋、叶灵凤、刘大杰、胡秋原、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田汉、魏金枝、周扬……这些人，从守旧的遗老到革新的健将，从“资产阶级”文人到“无产阶级”作家；不单有他的同胞手足也有他昔日的朋友，不单有骚人墨客也有文坛以外的科学家。除了少数昙花一现外，

大部分后来都做为现代文化史的要人载入史册。所以，单单是浏览一下这份名单，就足以让我们充满好奇——到底是何缘故，使得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鲁迅闹出纠纷？

其中，鲁迅的性格，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点，这当然也是受到了当事人的暗示。那个曾对鲁迅恭执弟子礼后来却攻击最力的高长虹，在《走到出版社》一文里，以亲炙者口吻，突出地从为人方面指责鲁迅难以相与，如“虚荣”、“只知道有他自己”、“为一多疑之人”等等，乃至有“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见鲁迅《捣鬼心传》）的耸人听闻之言。固然，像高长虹这样始而把人捧为“思想界先驱”，未久却一翻脸“迭加嘲骂”的人，本身人品便极可疑，因而实在很难令人相信他对别人人品的评论。然而，就鲁迅的性格发同种论调的，远不止一个高长虹。阿英于《“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中称，“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惟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反我者就是反革命’”。潘梓年的《谈现在的中国的文学界》说鲁迅“气量太窄了”、“尖酸刻薄”。施蛰

存也借谈论伏尔泰指斥鲁迅存心不“宽厚”，气量不“大”。沈从文将鲁迅概括为“睚眦之怨必报，多疑而无力向前”。一九三六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已跟鲁迅“闹翻”的徐懋庸负气写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白莽遗诗序》里说到，白莽这青年倘不早死，鲁迅先生会不会终于跟他闹翻呢，这连先生自己也说不定，这话分明地说明着鲁迅先生的性格。”又自称他给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为“忠言逆耳”，来暗示鲁迅的刚愎。其时，与鲁迅缘慳一面但打过笔仗，此刻却试图在一边调和双方矛盾的郭沫若，也拐弯抹角地说，过去他“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指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郭氏虽倭己为“妄生揣测”，其实却透露出当时文坛流行着关于鲁迅性格的一种口碑，那自然是在“宽怀大量”的反面。

我们后来人是断然弄不清真相的，不过，彼时彼地，那么多个中人都对鲁迅的性情有所



挑剔，大约不会全是捕风捉影，这一点，倒不必特意地“为尊者讳”。不过，无论如何这只能**是**极表浅的原因。天底下脾气怪异者甚多，但**大家**独独挑中了鲁迅开火，则于情理不通。**其实**，内在的必然的原因，还是原于鲁迅的思想**特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乃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变动大转折的文化，就像历史上任何这种**时刻**一样，它也会将自己的全部重大矛盾与**主题**凝聚在某一个特殊人物身上，例如，近代法国之有卢梭、德国之有歌德、俄国之有托尔斯泰，或中国春秋时代之有孔子……对五四前后的现代中国而言，这个人物便是鲁迅。除却他，我们并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具有如此丰富完整的代表性，以致国粹派目之为“卖国贼”，革命派却将他划归“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文人以为他是领“卢布”津贴者，“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却嫌他不够左、太人道主义、躲在“象牙塔”里不出来等等。确切地说，他是个哪一派都不感到满意的人，他的某一反对派不满意于他的地方，恰恰又为相对立的反对派所否认，比方说新党以为他保守甚至

在精神上应该被宣布已经死去，旧党对此却万难苟同而竭力将他描绘成数典忘祖的洪水猛兽般人物，而事实上，鲁迅确实不像他们那样泾渭分明地非新即旧，却是近代中国文化多重矛盾的统一体，是罕见地跨越了传统文化、启蒙主义、民主派直至最新的无产主义思潮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正因为这样，中国现代文化的聚光灯便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形成一个焦点，招致那么纷杂的持着各式观点的人们与之辩诘、冲突和碰撞。这一点，实在和春秋战国时孔子其人其说极为相似，那时，墨、庄、孟、荀、韩各家，无论其对孔子尊贬吸拒，都不得不将他视为主要的思想对象或对手，要么揣摸他，要么与他“过招”。这样的戏剧性情景，历史在其每一紧要的关头，总会上演一次，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而言，这一幕是落在了鲁迅身上了，其表面上也许如《恩怨录》编者所言，掺杂着私人之间的某种“恩怨”，但在内里上，其实无所谓“恩怨”，却是一个时代在文化上的裂变和重构所必然导致的精神价值的冲突过程，只不过采取了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倘使我们能早一些理性地看待鲁迅及其论敌间的论争，则不单好些个人悲剧可以避免，整个文坛也不至于长时间埋陷在恩恩怨怨的旧帐里。文化的论争，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就其根本说，对历史也完全是积极的，如果有一种理性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该衍生宗派倾轧、人身迫害的流弊。

## 自 疑

一个有头脑的人文知识分子，必是不肯以现实为满足的人；而不肯以现实为满足的知识分子，又必是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因为不肯以现实为满足，于是怀疑；因为怀疑，于是反叛、批判或者逃世。

我所知道的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间最大的怀疑者，是鲁迅。他将其所见到和经历的，终皆置于怀疑的目光之下。最早，是从父亲的死而怀疑中医的无能，于是去日本，立志学得被他相信为科学的近代西方医术。在日本，由于目睹同胞对一部日俄战争纪录影片中中华俘被杀场面的麻木表现，意识到健壮的体格未必等同于健强的生命而怀疑医学能否救人，就此弃医从文，欲以笔疗救国人的魂灵。从文

后，他以传统文化的根本怀疑者姿态出现在文坛，被目作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通过一个狂悖的清醒者之眼，将数千年以仁义礼智信一类词藻写就的“历史”，读作“吃人”二字。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完全不信其为真，这怀疑终于化作了可怜的阿Q、摆弄文明棍的假洋鬼子等小说形象。然后他一度强烈地寄希望于青年，但这样的信赖也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随着对青年的热望一道消失的，是他早期思想中的进化论这个核心……当小说集《彷徨》发表后，鲁迅再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目的论者。

后期的做为杂文家的鲁迅，纯然是一个无情的甚或尖锐得近于刻薄的批判家。深重、无所不在的疑虑几乎阻断了他同现实对话的可能性，那原本便瘦削、倔犟的面容，额外地增添了一种似乎一直滞留在那里的冷漠。他在忠实于自己血管里燃烧着的良知的同时，冷峻地与所有人保持着某种心灵上的距离，这使他即便在不少“同一营垒”里的人眼中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子”。他随时在提防别人，以免再次品尝到由于轻信而导致的失望感、受骗感。他

是二三十年代文坛的大师和精神象征，但同时却又始终是一个孤独、落落寡合的作者，在内心始终是一个个结盟者。

不必讳言，鲁迅的多疑有时是过敏的。在他攻击的对象里，有些实在担着点冤枉；他一味否定过的事物，未必都应该否定；他的“好斗”（如他自己所说“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恐怕也不总是必须的，设若换上别种方式跟人理论，效果会更积极一些……凡此种种，大约都可算鲁迅身上要被后人指摘的“缺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若干缺点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现在渐渐有人或明或晦地拿这些缺点讥贬这位斗士，以为他过激、不宽容、极端化的凭据。中国人因为不喜欢把话说绝，所以历来不大喜欢斗士一类人物，于文坛上尤其如此。现在，那么多人主张“兼爱”，主张文化的多元主义，鲁迅式的风格就更不适合他们的口味了。

但是，尽管今下众人普遍不赞成批判而偏

爱“吸纳”，我仍谋求他们允许类似于鲁迅这样的生性疑世的知识分子以一席之地，哪怕他们疑错了，将来的人们也大有纠正之的余地，更何况可能疑对了呢？其次我以为，不再从自己体内感受到怀疑的冲动，或者说失去了这种痛苦的折磨的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自己剥夺了自己做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

但在仍然表现出怀疑的姿态与企图的人当中，也需要我们仔细甄别，特别是对有些极其热衷于让别人意识到并且激赏他的怀疑情绪的人，可千万要小心，因为这种人中，往往隐藏着伪怀疑者，他们怀疑一切的夸张言行，不过是对其独断本质的巧妙掩盖。

有一个可靠的方法能助我们检验真怀疑与伪怀疑：真怀疑者，除疑世之外必自疑；伪怀疑者则可能排斥任何东西，惟独不怀疑自己。那些对鲁迅的愤世感到不安，受到刺激的人，心中想必都存着一种光明正大的理由，“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所以不能容忍偏激。反之，凡是偏激之人，他们就一定以为是独断，是惟我独尊而视他人为朽木粪土。但我倒想跟他们讲讲这道理：并非

在公允和偏激之间，只有宽容和独断；有一类头脑，它不宽容，也绝不独断，却彻底地无条件地怀疑；这怀疑不表示它肯定什么，只表示它不能肯定什么，连同它自己在内。这样的怀疑者是迷茫的，他明知往前走下去是虚无，是“坟”，但仍旧走下去，“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他的怀疑，根本而言是指向自己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因此，鲁迅的内心，宽容论者不懂，独断论者亦不会懂。而今，倡宽容者对他颇有微辞，欲以一己理念罢黜别人的人却把他引为同调，这两种情形都令人发笑。

所有这些人们，何不细细吟味《影的告别》？那里有话言道：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 宗教之果

十年前，读韦伯(Max Weber)、谈韦伯，大约是件很时髦的事——德国一名韦伯研究者在其文章中颇得意地说：“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的《新教伦理》的译本，在北京几个钟头就被抢购一空。”——盖因韦伯有一著名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伦理有其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东方（自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缺乏这种宗教伦理体系，所以就on不可能通向资本主义。这理论，在八十年代急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阶层心中，搅起许多不安来，于是，从宗教角度讨论和批判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即成热门，以至于说中国无“真正的宗教”，